18 世纪韩国儒学与考证学

徐垌遥

中文提要：本文主要考察对于 18 世纪以实事求是作为基础而展开的韩中儒学交流当中考证学的辩论。进入 18 世纪的朝鲜后期，北学派对清代学术开始持开放性的态度。他们随同燕京的“使团”，频繁往返于韩国与中国两国。他们认为清代的文物制度继承了悠久的、传统的中华文明，其百姓又是汉唐的后裔，从而提出了所谓的“北学论”。这种慕华思想发展为小中华主义，致力于所谓“朝核心”的培养当中。这种对文化持开放的态度脱离了以往的道学的思想体系，正确地把握了清代学术的真貌，给韩国学术界增添了鲜明的考证学的色彩。考证学并不是思辨的学问，而是一种治学方法。如果考察 18 世纪韩国儒学的发展面貌，就会发现其考证学的性质其实是与实学相关的。考证作为学问研究的方法论，其目的就在于给古训提供专业性以及细密性。

考证学通过证实古训的治学方法来寻求真理。尚古的实证主义的“证实”就是实学家们学问的基本精神所在。这里的“实”指的是坚持近古、存古、尊古等态度的、对“古”的考证。这就需要折中汉学的专门性以及宋学的精髓性，恢复儒学本源的实际性，从而把握圣贤垂训的真相。这就是“博文约礼”的精神所在。

考证学的精髓就在于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起来的科学精神上，这就需要贯通汉与宋。实学包括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等三个方面，如果与儒学的本质相结合起来看，实事求是的倾向性与考证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正如古典

超越古今中外的时空性而为人们所解读一样，实学是一种求真、求是的博学的根本精神所在。实学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发展为实理、实事、实心三位一体的真正的儒学。道学注重实理，实学则重视实事，但是圣贤之学是“下学而上达”、“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一种主客相结合的学问。这里“而”的境界就是实心。对于实心，在《书经》里指出正德观念是人类自我的诚实性，是一种追求平实、精详的想法。

总之，结合了主观、平心的诚实性以及客观论理的实事性的综合的理解，才是考证学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考证学，实理，实心，实事，实事求是

一、序言

韩国的学术文化不仅在地政学的角度而言接近于中国，而且一直倾向于对先进文化的构筑，在这种背景之下吸收了中国的学术文化。如果考察传到韩国从而产生影响的内容，无论是文献学方面还是在解释学上的理解程度，都具有独自的发展轨道。例如，将中国的文字说成是“汉字”、“汉文”等，新罗时期国学当中读书三品科的基本课本是《论语》和《礼记·曲礼》篇，将宋明理学理解为性命义理之学等等。这是因为韩国学术重视关心人类，具有人伦日用之道的儒家经典的缘故。

清代学术界在所有学术领域里将文化全面的集大成作为其基调。考证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思潮，不是思维方法，而是一种研究学问的方法论。尤其在儒学领域里它只不过是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一种研究方法论而已。儒家经典里记录了人伦日用之圣贤之道。考证学通过正确的方法来寻找人类的正确的生活方法，这就是“道论”。其学术的主要对象当中，对人类关系与日常生活的方法，进行经学解释的广泛的分析成为了主流。儒家经典解释学的传统方法大致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为分辨经典的真伪性而发展而成的训诂学；另一种是义理学，它受到了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发展而来的义疏学的影响。以经典的实事辨别为主的所谓的汉学与以经典的义理解释为主的所谓的宋学就是其具体的体现。

韩国儒学在学术上具有保守性。我们可以看出并没有同时吸收了宋学、元学、明学、清学等学问，而是比中国滞后一段时间以后才接受其学问。被称作是程朱道学的宋学，被理解成孔门心法精髓的中庸思想，以及在现实当中试图实现圣贤之道的意图等等，就是其很好的例子。再者，这种学术并不是从中国学者那里得到传授，而是韩国学者自己直接去领会并且吸收而来的。所谓自发的保守性并不是一种横向的扩散，而是具有纵向深化的倾向性。无论哪个时代，这种保守

性都是源于坚持接近儒学的本质与真髓的态度上。这种学问的态度是朝鲜儒学发展成一贯的诚敬思想这一独自的道学、圣学、礼学、实学的原动力。其中实学思想家们则受到了考证学的影响。

进入 18 世纪的朝鲜后期，所谓的北学派对清代学术开始持开放性的态度。“北学”出自于“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①

朝鲜是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社会。但是那时由于嫡庶的社会问题的缘故，士与政界的大夫分离开来，只是为了学问而做学问的朴学的氛围得到了高涨。他们随同燕京的“使团”，频繁往返于韩国与中国之间。他们认为清代的文物制度继承了悠久的、传统的中华文明，其百姓又是汉唐的后裔并且是明朝的逸民，从而提出了所谓的“北学论”。正如以洪大容、朴趾源等人为中心的统称为北学派的一群知识分子集团，试图通过学习中国的先进文物来发展朝鲜。他们的主张指向于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经济的全面改革。这种慕华思想发展为小中华主义，致力于所谓的“朝鲜心”的培养当中。朝鲜后期，实学著述了许多百科全书类的著作。

这种对文化持开放的态度脱离了以往的道学的思想体系，正确地把握了清代学术的真谛，给韩国学术界带来了鲜明的考证学的风气。

实学包括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等三个方面，如果与儒学的本质结合起来看，实事求是的倾向性与考证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正如古典超越古今中外的时空性而为人们所解读一样，实学是一种求真、求是的博学的根本精神所在。实学家的终极目标就在于要发展成为实理、实事、实心三位一体的真正的儒学。

实学是儒学的别称，是对儒学进行多角度的解释从而得到的名字。如果从一

^① 《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朴齐家（1750—1805），《贞蕤集·北学议序》。）

贯于实学或者性理学的根本纲领的角度出发，它是以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诚的思想为中心的，并且联结了原理、事实以及平心。实理探讨的是真实无伪，实事则讨论是非曲直，二者都是以专内实己的实心作为基础的。所以说以诚的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三位一体。好好保存这种实心从而精确地把握万理，用这种实心来适应万事。诚实以及直接的态度则使得成为可能。实理以及实事也都是从实心的主体性当中得到明辨以及笃行的。所以说理论与实际要想得到统一，需要一直维持中和的意识尺度。

二、实学思想的考证学要素

在实学的鼎盛时期，学术向多个方向分化，知识的对象也极大地得到扩大，进而扩大到专业领域，所谓为学问而作学问的朴学精神也非常明显。然而这种朴学容易陷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①的弊端当中。

成海应钻研于清代早期考证学者顾炎武、阎若据、胡沅、毛奇龄等学者的学术，批评了其考证的缺点。

“搜讨异闻，援引奇迹，欲补前贤之阙遗，思续古经之讹缺者，顾炎武之徒也。贪多而务博，眩奇而夸众，考校专于苛摘，辩论精于吹觅者，阎若据、胡沅之徒也。胡叫乱嚷不择高低，肆其口气，妄砥先哲，掇拾遗潘而谓传未发之旨，谈说芻狗而诩，以独得之见者，毛奇龄之徒是也。”^②

在这里，他指出顾氏之学虽不急，但是应该被采用；阎胡之学是无用之物，应该舍弃之；奇龄之学是属于丑正之类的，应该排斥之。然而，在专业领域里

^① 司马迁，《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② 成海应（1760—1839），《研究齐全集》卷 9，《答洪学士爽周斥考证书》。

他只沉浸于辩证当中，可能会偏向于末端，被小事情所纠缠，陷于琐碎、犯错误。^①

金正喜正道出了实学的实事求是之属性。他指出：翁方纲是“存古而不泥于古”，段玉裁与刘台拱（字端临）则是“存古而泥于古”，他们都具有可议之处，后人应当做适当折中。^②存古是为了体会古代的原委。之所以以师承的家法作为手段，是因为重视以古代为基础的客观。“古人文章，各有师承家法，沿革流变，不可胜当末流之弊……大力量大手段，起以整顿，是即矫绮丽之末弊而已。”^③家法渊源流长，若以此作为手段，将会给易陷于轻率的判断之中的我们指引一条正道。例如“凡到泰山顶自无更进一步处，则不得不从旧路下来而已”^④，正指出了存古的迫切性。但是在这里不得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误入门庭则会犯重大失误，应细细着眼，而着手则要猛，这很重要。他的存古之态度不仅仅是博学，还指向了正确的门路，从而持公平的见解来明辨是非，使得不陷于空虚当中。^⑤

正如以上所示，证实学试图通过古训的“求是”之治学方法来寻求真理。实学家的学问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尚古的实证主义的“证实”性上。这里“实”指的是坚持近古、存古、尊古等态度的、对“古”的考证。“古是古代实际存在的，古代是指先民，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再三咀嚼，慎重地进行考虑，从而‘以古订古’。即古代蕴含着事理，是非都应该以古代为依据，而不是自身。美是自发地美，并不是我让它美；丑也是自发地丑，我并没有干涉它。我只是懂得时间越久远的就会越珍贵，值得去证实。”^⑥

在这里，他主张将真理解释为古道，微验地把握其本质，从而应该在实心当

① 成海应（1760—1839），《研经斋全集》卷13。

② 金正喜（1786—1856），《阮堂先生全集》卷5，《与李月汀书》。

③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4，《与李汝人最相书》。

④ 同上书。

⑤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1，《实事求是说》。

⑥ 申绰，《石泉遗稿》，《诗次故》后叙。

中理解实理与实事。这种基于古训的近古精神，并不是指复古，而是为了将事实如实整理出来，从而证实事实。

儒学本质之圣贤之道就在于人的主体行为当中，即亲身实践的躬行当中。陷于空虚的争论从而犯错误是不对的，也不应崇尚空论，而是应该追求实际才是正确的。虚论指的是没有根据，徘徊于杳冥之中，只是围绕在空阔的周围，而不能明辨是非，从而丧失本义。^①要想把握主体与客体，其标准就在于事实上。当理论与实际相协调，实践儒学所强调的圣贤之道才得以实现。

“故为学之道，不必分汉宋之界，不必较郑王程朱之短长，不必争朱陆薛王之门户。但平心静气，博学笃行，专主实事求是，一语行之可矣”^②。治学的方法并不在于划分界线、比较长短、互争门户，而是忠实于实事求是当中。

三、经典解释的汉宋折中论

韩国学术界关于考证学的争论，不仅包括对清代学术的关注，亦包括对汉、宋两学优劣的批评。洪奭周指出近来考证之徒不重视义理，而只致力于名物度数（名目、事物、法式、数量，译者注）的末端之上，从而只专注于博证。^③他批评了当时对汉学的倾向性。换句话说，“且博者必不专，不专者其业必不精，博者必分，分者其神必不完。其神不完，其业不精，而能有知者，未之有也”^④。这里强调若不够专、不够精、分散的话，会变得不完整。这就是一种所谓博文约礼的精神。

对于此，成海应说道考证是一种博学，考证的必要性在于分辨异同与是非。他强调要博学，从而能广泛地引证诸多学说。“夫物之同条而异贯者，不得不援

①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1，《实事求是说》。

② 同上书。

③ 洪奭周（1774—1842），《渊泉全书》7册。

④ 《渊泉全书·答成阴城书》。

引的据而证之。训之似是而实非者，不得不广引他说而证之。性之犬牛之分色，而马雪之谕，孟子亦尝言之矣。”^①

“今之为汉学者，诋宋学以空言。为宋学者，诋汉学以陈言。汉学主于经，宋学主于书，然殊未知经与书合。初未尝有分，易之乾二。庸言庸行之训，即一部中庸。书之克明峻德，即一部大学也。诗礼春秋之于语孟，无不与之表里。则执经而遗书，劬书而捨经，固不可也。”^② 这里指出了以汉学与宋学为主的人们，相互以空言与陈言来讽刺对方，从而将五经与四书分离开来。只有通过辨证之后的穷理，才不是空论，也不会陈腐。

与汉学中的实事相距甚远的陈腐的言语和与宋学中的实理相分离的、没有根据的空虚的言语当中，通过平心与博学，以实心来研究学问的方法才是将博考与精致相结合的，所谓“博精之妙”的态度。考证学中训诂学的援用，并不仅仅是为了驳杂。博古是为了探索百家之言，从而不陷于偏见，以求得精实。即是说为了将以诚思想为基础的主观客观化，强调“博而精”。

如果将汉学的专业性与宋学的精髓性折中起来，恢复儒学本源的实际性，那么可以把握圣贤垂训的真相。这才是“博文约礼”的精神所在。

考证学的精髓就在于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科学精神之上，所以应该结合汉与宋。这是一种折衷并且克服错综这一矛盾的方法。

“到了宋儒，义理变得更加精密，但是宋代诸儒们却自认明理，处处显耀之，从而往往蔑视古训……怎能以后人所习得的思想作为依据来修改自古以来师承的古训？……古人的师承是有渊源的，不能以后人所习得的思想来概括之。”

^③ 与此同时，不了解宋学的优点也是不行的。“义理之学与考订之学里，考订之学是指汉学，义理之学则是指宋学。但其实二者是相同的。即使过了千万年，也应该尊崇孔孟的心传，忠实于程朱，这是千古不变的。读书人束发读书，学习程

① 《研经斋全集》卷9，《答洪学士爽周斥考证书》。

② 同上书。

③ 藤塚隣、翁覃溪的《研经指导》和金秋史的《清朝文化束传的研究》再引。

朱等大儒的议论，又学习诸多书籍，见闻日广，后来藐视宋儒之学说，甚至叛离程朱，这实在是蛀蚀士林。”^① 理应不能偏重于汉、宋二者当中的任何一方。

这种追求主观的诚实性以及客观实事性的综合性的理解才是考证学的核心所在。

正如以上所示，主观、平心的诚实性以及客观、论理的实事性将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的理解，才是考证学的主旨所在。

四、结语

主张 18 世纪韩中儒学交流的基础即是“实事求是”。本稿不仅考察了 18 世纪中国考据学对于韩国“北学派”的影响，也考察、折衷了汉学的专业性以及宋学的精确性的汉宋折中论，从而揭示了东亚儒学相互的交流以及影响之间的关系。

考证学并不提示某一思维或者思想，它是一种治学方法。儒学一贯的思维方法就在于孔门心法“精一执中”。而清代学者戴震也做过与考据学和求道有关的论述。18 世纪中国的考据学不仅是一种求学的方法，而且也是一种对于思维方法的变革。

如果考察 18 世纪韩国儒学的发展面貌，就会发现考证学的性质与实学相关。考证作为学问研究的方法论，其目的就在于给古训提供专业性以及细密性。韩国实学当中的考证学要素就是指它的实事求是的学问的态度。本稿议论的主题就在于为了正确掌握圣贤之道，强调经典解释的开放性。具体说来需要对汉学与宋学进行折中。

一般来说，以形而上的观念性和形而下的实际性，抽象与具体，观念与经验等来分辨道学与实学的差异性。换句话说，道学注重实理，而实学重视实事。

^① 同上书，再引。

但是圣贤之学是“下学而上达”、“尊德性而道问学”，所以是主客相结合的学问。这里“而”的境界就是实心。所谓实心，在《书经》里指出正德观念是人类自我的诚实性，是追求平实、精详的想法，正如《中庸》中的五学。

(作者系韩国 成均馆大学教授 / 姜雪今 译)

参考文献

- 《孟子》，《史记》。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
朴齐家，《贞口集》。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
申 绰，《石泉遗稿》。
洪奭周，《渊泉全书》。

Korean Confucianism and Bibliographical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Suh, Kyung Yo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fucianism exchange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in the 18th century was a history of Bibliographical Debates. Its foundation was the theory *Shishi Qiushi*(实事求是), an academic attitude to seek the truth based on the fac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18th century, Joseon scholarship became to the Qing scholarship. *Bukhakpa*(北学派), a school to asserted to learn the North, the Qing dynasty, led so-called academic openness. *Bukhak* scholars frequently accompanied with envoys to Yanjing as a member of suite. Whilst the sojourns, they realized that civ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s of Qing Dynasty succeede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people of Qing were descendants of Hand-Tang Dynasties. Then they introduced the theory of *Bukhak*. This kind of admiration for China developed into the Little-Sino-centricism and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develop so-called the heart of Joseon (Joseonsim, 朝鲜心). They broke from the then orthodox Daoxue (Learning of the Way, 道学), introduced its true character. Since then, Korean scholarship also characterized itself with Bibliographical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Korean Confucianism in 18th century, the Bibliographical Study was related to Practical Learning(*Sirhak*, 实学). As a research methodology, a historical research i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ism and minuteness of exegetical studies to verify the truth.

Verification of the truth is to seek for the truth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Shishi Qiushi*. Practical Learning scholars took verification of the truth as a fundamental

attitude,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as positivism that pursues the ancient times. It was to revive realism of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that the sacred sage taught by compromising professionalism of Han dynasty scholarship and the spirit of Song dynasty scholarship. This was the spirit of '*Bowen Yueli*'(博文约礼).

The essence of Bibliographical Study was to think scientifically that merges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Therefore it was to compound Han and Tang dynasties. Despite of the other aspects of Practical Learning, it can still be said that *Shishi Qiushi* was most closely linked to Bibliographical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 in consideration of Confucian element. The aim of Practical Learning scholars was to develop into the true Confucianism where *Shili*(实理), *Shishi*(实事) form a trinity within *Shixin*(实心). Daoxue values *Shili* highly and Practical Learning lays an importance on *Shishi*. However, Learning of the Sacred Sage merges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Synthetic understanding of sincerity, which controls one's heart subjectively, and realism, which seeks for the logical truth, was the essence of Bibliographical Study.

Key Words: Bibliographical Study on Chinese Classics, *Shili*(实理), *Shixin*(实心), *Shishi*(实事), *Shishi Qiushi*(实事求是)